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张正光,沈泽俊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中央领导层和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特定视角和内容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随着许多独创性见解的提出,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议,亟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4-0061-08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Zhengguang, SHEN Zeju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t has alway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central leadership and historian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in-depth excav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f many scholar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ny original idea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troversi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Chinese revolution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制度是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简称联共(布))用以直接指导中国进行革命、加强对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直联系与管理的主要手段和路径。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到第一次大革命前后,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等历史人物以驻华代表的身份被共产国际派

收稿日期: 2018-05-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基金资助项目(13JDSZK0022);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基金资助项目(2016yks090)

作者简介: 张正光(1971-),男,安徽南陵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沈泽俊(1993-),男,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遭到中国革命中来,他们既是中国主要政治活动和事件的参与者,也是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挖掘与探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视角与特定内容,对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研究现状与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学术界亦开始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不断深入推进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并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研究热潮。此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断丰硕,在基本立场和重要判断上共识颇多,基本形成了我国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逻辑与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巨大挫折的消极影响,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大量关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历史档案得以公布与解密,加之国内研究队伍的日益专业化和不断壮大,使得学术界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视角不断深入。学者们通过广泛探讨和细心挖掘,对该段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观点和论断,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活动和影响的视角探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也被广泛认可,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内容,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21世纪以来学术界继续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夯实了基础,做足了准备。

近30多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最直观地在以下两个方面呈现出来:第一,整理和翻译出版了部分重要文献档案与资料^[1-6],包括一批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顾问在华活动的资料以及个人回忆录^[7-33],这些资料的面世使得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成为可能。第二,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提出了许多奠基性的论断,新的论点层出不穷^[34-37],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特别是对于全面把握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具体策略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俄驻华使节和顾问在华活动的侧重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和研究路径参考。

二 研究的热点与主要内容

(一)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人员、身份与来华时间等基本情况的研究

研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1919年共产国际诞生以来先后派遣了哪些代表使华、这些代表的身份是什么、是个人使华还是代表团使华、使华的具体时间等。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热衷于探讨这些问题,时有争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一是共产国际组织机构本身的复杂性,二是苏俄与中国革命联系途径的多样性,三是碍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特殊的工作性质和频繁调动。

1.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人物与身份的研究

向青^[38]较早地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他认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主要有魏金斯基(现通译为: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现通译为:罗米那兹)、米夫等。其中,关于这些人物初次使华的身份,向青认为,维经斯基是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的党员身份被派遣使华,与其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娃、斯托扬诺维、马迈耶夫、波林、杨明斋等人;马林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被列宁派遣使华的;达林则是以少共国际代表身份使华的;越飞是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使华;加拉罕使华身份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鲍罗廷则是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派驻国民党代表双重身份使华的;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身份使华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使华;米夫受联共(布)中央派遣,1927年作为宣传家代表团团长使华。向青关于这些代表初次使华的身份的研究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把以上不同机构派遣的代表人物统一当成共产国际使华的主要人物来看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文将立足共产国际相关文献资料对以上历史人物的身份属性进行说明和界定。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发掘和考证了若干鲜有提及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人物,如尼克尔斯基和利金;另一方面,学术界力主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苏联政府使华代表、顾问以及联共(布)中央使者区分开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0]认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主要有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达林、鲍罗廷、罗易和罗米那兹。

2.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使华时间和次数的研究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主要人物中,学者们在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实际时间和次数问题上分歧较大,传统观点有维经斯基“六次来华”说,也有学者提出“五次来华”说。其中,1920年春维经斯基首次来华,除了在具体月份上存在分歧,这是关于其来华的诸多记载中争议最少的一次;而有关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学术界争议较大,据《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28]记载,1923年11月初是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1924年4月和11月、1925年7月、1926年6月维经斯基又4次来华。而周利生等^[23]、魏黎波等^[39]认为其于1923年底来华不实,指出第二次来华应该是1924年4月,因此认为其共来华5次。关于其他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来华时间和次数,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马林来华4次,鲍罗廷来华1次,罗易来华1次,罗米那兹来华1次。虽有学者关注到鲍罗廷曾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从北京返回广州途中“外经”库伦(乌兰巴托)、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这里并不能看作其再次使华。

(二)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组织机构的研究

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密切相关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和演变是研究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长期以来,由于这些机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的缺失,中俄(苏)学者们没能弄清楚这一基础性问题。近年来,中外学者们通过不断加强交流以及对史料的充分挖掘,逐渐理清了与驻华代表有关的组织机构的基本情况。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梳理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及其历史演变。李颖^[16]在研究俄国学者索特尼科娃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创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0—1935年),共产国际负责中共问题的组织机构经历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上海)、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执委会

东方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地区)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5个大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还先后3次间断性地设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这些组织机构及其代表们既对中国革命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也由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进行过错误的干预。李玉贞^[17]和黄修荣^[37]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但是李玉贞对1923年1月在海参崴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隶属关系和存在时间上持有异议,她认为从俄国权威文献资料上分析该局应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但也有材料表明该局属于东方部下属部门,同时关于该局存在的时间,李玉贞认为该局一直工作到1926年,并非仅有半年时间。

第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黄黎^[40]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的上海远东局从成立到解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特别是对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与陈独秀、鲍罗廷关于北伐态度上的分歧以及处理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关系上的失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王新生^[41]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展开研究,提出联共(布)中央在1927年上海远东局后期曾有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的打算,并认为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直接指导在中国革命起始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却压缩了其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三)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活动和事件的研究

1.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维经斯基和马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人物是早期苏俄方面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在肯定其传播贡献的同时,应该正视他们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关于这个问题,部分学者从传播方式、传播对象和内容、传播特点和贡献等角度展开了初步研究。

第一,着重对共产国际代表早期在中国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研究。蔡丽^[42]认为以维经斯基、马林主要代表的共产国际人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是通过交谈、座谈、演讲等方式进行直接传播;二是建立各种机构或组织进行传播;三是通过各种出版物进行传播;四是通过支持运动和开展纪念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播。

第二,关于驻华代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的研究。胡云霞等^[21]在分析维经斯基初次来华使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渠道的基础上,认为维经斯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传播内容主要涉及对苏俄及其革命和建设的宣传报道,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介译和出版等。

第三,有论者对驻华代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贡献进行归纳与总结,认为维经斯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实践性;二是注重传播的多样性;三是注重运用列宁的建党原则,排除各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43]

第四,有论者从传播学视角对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新闻宣传活动展开研究。如张继木等^[44]论述了维经斯基在华新闻宣传活动的环境、内容和实际成效,认为维经斯基的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了解,也促进了中国马列主义新闻宣传局面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有学者认为应当以维经斯基等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发生联系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同历史阶段的关键点,针对学界传统观点上把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拐点提出了异议,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驻华代表在中国早期的具体活动为中共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胡云霞等^[45]认为维经斯基使华主要从三个方面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和中共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是协助陈独秀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二是运用媒介大力传播共产主义,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三是积极培养

进步青年,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也有部分学者从中共建党思路方面探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共创建的深远影响:金立人^[46]提出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建党思路,维经斯基力求规模效应,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依靠对象,误导了中共创建;而陈独秀力求党组织的纯洁,其建党思路才是正确的。方宁^[20]则认为维经斯基帮助中共建党思路的确立和发展是共产国际的基本要求与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维经斯基帮助中共建党的思路虽然与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因为各自认识、立场、角度的不同而在具体方式、方法和路径上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仍是相互合作、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的,且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分析和肯定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在其贡献“度”有多大的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即中共的建立是在已有的社会历史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与指导的结果,还是共产国际代表亲力亲为的结果,这要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本,再结合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活动成效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3.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国共合作战略方针的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课题,一直备受相关学科工作者关注。这是研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学术难点,它涉及到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苏俄驻华特使、中共、国民党、北京政府等诸多政治势力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的角逐与联合,是一个万绪千端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国共合作的形成这一条主线,对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共识颇多但分歧不少。近年来,学者们以马林与国共合作战略方针的形成的研究为中心,继续拓展深化了其他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国共合作关系的研究,将视线延伸到国共合作形成之后的分化与演变。譬如,周利生等^[22]对维经斯基提出的“从联盟转向联合”的国共合作形式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是一种介于党内合作与党外合作之间的新的合作形式,可以看作是驻华代表针对五卅运动以来国共合作纠纷的激增和中共内部萌生退出国民党倾向的主动关注与回应,

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相关论述进一步进行探讨。这种研究思路 and 方式对于学界深化国共合作的研究与再认识十分必要。

4.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大革命时期三次“大让步”的研究

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共三次“大让步”联系紧密,它是大革命初期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指导失误的重要表现。关于这三次“大让步”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赞成周恩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就第一次政治“大让步”而言,黄修荣等^[47]通过对维经斯基在统一战线上的态度进行梳理,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极力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支持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孙科等进行谈判并达成七项协议,最终致使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按照既定妥协方针对国民党作出让步,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48]指出鲍罗廷在此次妥协退让中向中共施加了消极影响。关于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山舰事件”的关系,学者们研究认为布勃诺夫使团负有主要责任;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倾向缺乏警惕,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近一个月才返回广州,并采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这是布勃诺夫使团妥协退让政策的继续,是共产国际、苏联对华方针的具体体现。还有论者对事件发生后鲍罗廷的思想动机进行分析,认为其阻挠和反对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欲满足蒋介石的任何条件以换取苏联和国民党脆弱的联盟,包括牺牲中共的利益。^[49]关于共产国际代表与整理党务案的关系,张留见认为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蒋介石、张静江会前达成协议,会上强迫中共代表接受,会后又把既成事实强加给中共中央,不是陈独秀强迫中共代表接受的。^[50]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三次“大让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味地将右倾退让错误推诿到中共中央特别是陈独秀身上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以及驻华代表对形势的误判是重要因素。

5.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导火线,而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则被看作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一次重要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诱因,因而罗易视为革命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近年来,学界对该问题认识的深度和角度不断扩展,罗登华^[51]从大革命时期宁汉对峙的客观局面、汪精卫的左右逢源、罗易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双重认识以及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分歧出发,提出泄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不是罗易的“极端糊涂的行为”,也不是他刻意背叛革命,罗易只不过恰好扮演了一场悲剧的启幕者而已;谭晓辉^[52]指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必然产物;苏杭^[53]认为致使罗易泄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同鲍罗廷之间分歧的激化和对中共领导人的极度失望,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实际是莫斯科对华政策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的反映,然而争论的双方最终都成了替罪羊。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已经更多地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失误和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出发,不再简单得归罪为罗易或鲍罗廷个人。

6.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其他活动和事件的研究

除了对上述活动的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共产国际代表与20世纪20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1925年“上海谈判”等事件展开探究。如陶飞亚^[54]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维经斯基、达林等人直接指导和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他们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张留见^[55]对维经斯基策划1925年“上海谈判”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肯定了谈判的积极意义;周利生^[56]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指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人物关系的研究

与陈独秀关系的研究。史学界历来对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具有浓厚兴趣,从建党之初维经斯基主动联系南陈北李,到马林与陈独秀

之间关于国共合作关系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再到合作过程中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以及大革命中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与实践,乃至到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后的革命思维转化,姚金果等学者从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发表的论著很多,有力道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不少,并且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也十分广阔。

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周利生等^[23]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中心,对两人的会见、维经斯基与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支持和悼念等加以考察,从另一个层面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李杨^[57]分析了“北京政变”后鲍罗廷在推动孙中山北上过程中所扮演的推手和设计者的角色作用,认为正是在其积极促使下,国民党显示出比其它实力派更能承担起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动员任务,孙中山利用其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优势,扮演了民族运动组织者的角色,一时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李玉贞^[36]对马林和孙中山的关系也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

与蒋介石关系的研究。银品^[58]对鲍罗廷与蒋介石关系的分合展开探究,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二者从助益与获益到互为借重,再到猜忌与分歧,直至最终走向决裂的过程,指出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合作”基本上以彼此互相利用为前提,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政治利益是二者之间分合的根源;黄家猛^[59]就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进行研究,他对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缘起、策略和步骤以及驱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反映出中国革命环境的复杂性:既深刻体现了鲍罗廷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中共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与瞿秋白关系的研究。周利生等^[60]通过回顾大革命时期国共党内合作的实现及其曲折实践,试图厘清维经斯基与瞿秋白在是否建立党内合作、党内合作中是否保持独立性、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以及国共合作方式的调整等问题上的异同,进而以此切入点深化对中国大革命的认识;张秋实^[61]探讨了罗米那兹与瞿秋白的关系,认为二者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

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另外,张秋实^[62]、丁言模^[63]等学者还就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关系展开系统研究,形成了部分代表性成果。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人物关系的研究十分庞杂,以上只是简单地陈述了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关于这层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颇有价值的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五)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历史贡献的评价

关于历史贡献的评价和总结,学者们一般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既有重要贡献也存在严重失误。如李传兵^[64]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贡献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帮助中国革命,军事上援助中国革命,在人才培养上支持中国革命;严重失误主要表现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三次大退让以及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指导方针的错误。朱荣英^[65]认为,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中国中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行为,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需要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工作

综合分析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历年来学术界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比较有限,没有形成一部系统论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学术界主要还是依附于世界革命的大背景,或是从宏观和整体视角对共产国际理论和战略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或是偏向于从某位驻华代表个人的视角过于微观地进行探源,没有突显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这个特殊的、极具主动性的群体的重要作用,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看作共产国际向中国传递和灌输理论与策略的执行人,看作是共产国际高度集中领导体制下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革命是具有自我见解和特殊认识

的,他们之所以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休戚相关,绝不只是因为工作关系被派遣到中国而已,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与中国革命始终保持着深度互动。在国内外研究资料日益丰富的学术背景下,针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挖掘得不够深入是学术界在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时出现诸多分歧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笔者认为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需要在宏观层面厘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情况所确立并制定的理论指导与阶段性战略,这是引导与束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华活动的思想前提;第二,从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方面加强对驻华代表的群体性研究,弄清楚其身处的体制机制环境;第三,充分运用和挖掘现有史料,对主要驻华代表的历史活动开展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析其指导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第四,在评价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上,既要找到闪光点,也要客观公正,切忌笼统性地评述。长期以来,凡是涉及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人物、活动、事件等方面的评价问题,学者们基本秉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宏观论述,因此,在谈到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评价时,很多学者往往套用其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整体性评价,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有着双重影响,积极贡献和严重失误并存。毋庸置疑,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驻华代表的历史功绩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一味地依附于宏观性的整体性的评价,不注意驻华代表个体的特殊性,忽视驻华代表与共产国际上层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在中国革命具体问题上的异同点,在具体论述中要注意平衡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1926—192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2] 孙武霞,许俊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1~3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3辑[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4] 戴隆斌,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58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01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3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90.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12.
- [7] 许俊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简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 [8] 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9] 王礼训,陈再凡,程玉海,等.共产国际历史新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 [11] 张秋实.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 [13] 王占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14]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5] 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来的人[M].殷罡,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 [16] 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J].中共党史研究,2008(6):108—115.
- [17] 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J].党的文献,2011(4):23—26.
- [18] 李传兵.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功过评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6):15—18.
- [19] 张奇才.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4):447—451.
- [20] 方宁.论维经斯基对中共建党思路的影响[J].党的文献,2011(3):29—34.
- [21] 胡云霞,李绍华.维经斯基初次使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家,2012(3):141—144.
- [22] 周利生,王钰鑫.“从联盟转向联合”:对维经斯基提出的一种国共合作形式的讨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5):56—60.
- [23] 周利生,王钰鑫.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再认识: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考察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16(1):237—242.
- [24] 张伟良.也谈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兼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J].中共党史研究,

2011(6):109-116.

- [25] 吴明刚. 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功过评析[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4(1): 54-59.
- [26] 曾成贵.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J]. 史学月刊, 2005(8): 54-60.
- [27] 李敏昌, 柳作林. 评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几个报告[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8(4): 71-74.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460-488.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增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 苏联顾问在中国(1923—192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2] M N 罗易. 罗易回忆录(上、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33] C A 达林. 中国回忆录(1921—192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4] 向青.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35] 杨奎松. “中间地带”的革命[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 [36] 李玉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7] 黄修荣.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8] 向青.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248-312.
- [39] 魏黎波, 赵蛟.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的实际时间和次数[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4): 72-75.
- [40] 黄黎. 国民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研究[J]. 北京党史, 2014(4): 12-15.
- [41] 王新生.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N]. 北京日报, 2012-12-24(19).
- [42] 蔡丽. 浅论共产国际代表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J].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2007(1): 115-128.
- [43] 陈琨. 维经斯基来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8(3): 25-27.
- [44] 张继木, 张琨. 组织传播视野下维经斯基在华新闻宣传活动述评[J]. 现代传播, 2012(4): 39-42.
- [45] 胡云霞, 李邵华. 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初次使华对中共建党的贡献[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0(6): 87-92.
- [46] 金立人. 创建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的误导与陈独秀的正确[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0(9): 10-13.
- [47] 黄修荣, 黄黎.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96.
-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152.
- [49] 王健.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的思想动机述论[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164-165.
- [50] 张留见.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7(6): 57-60.
- [51] 罗登华. 试论罗易泄密的原因[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28(5): 105-107.
- [52] 谭晓辉. 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1(1): 121-124.
- [53] 苏杭. 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原因新探[J]. 长白学刊, 2004(4): 89-94.
- [54] 陶飞亚.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J]. 近代史研究, 2003(5): 114-136.
- [55] 张留见.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J]. 学术交流, 2012(7): 199-202.
- [56] 周利生. 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 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7(4): 81-86.
- [57] 李杨. 鲍罗廷与孙中山北上[J]. 广东社会科学, 2016(1): 131-137.
- [58] 银品. 合作的尺度: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新探(1924—1927)[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6(1): 74-83.
- [59] 黄家猛. 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1(4): 88-97.
- [60] 周利生, 王钰鑫. 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对国共党内合作认识的分合[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6): 48-59.
- [61] 张秋实.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99(3): 65-71.
- [62] 张秋实. 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 [63] 丁言模.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64] 李传兵. 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功过评析[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6): 15-18.
- [65] 朱荣英.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J]. 开封大学学报, 2013, 27(4): 1-9.

责任编辑: 蔡燕飞